

***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 By FRANK N. PIEK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vii, 229pp.**

荷蘭萊頓大學人類學家彭軻(Frank N. Pieke)的*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 (《好的共產主義者：當代中國的精英培訓和國家建設》)，是目前海外唯一一部對中國黨校系統進行實證研究的專著，為我們提供了了解這一不太為外人所知機構運作的豐富材料。通過對雲南省委黨校的田野調查、幹部訪談和問卷調查，對雲南省下屬幾個地方黨校的訪問，對北京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市黨校以及北大、清華、人大等提供幹部培訓的普通高等院校的訪問，和對參與中國黨校合作的海外項目工作人員的訪談，作者為我們呈現了中國共產黨龐大而階層化的黨校系統以及它在改革時期的運作方式和發展狀況。然而彭軻的志向並不僅限於此，他更試圖透過改革時期黨校幹部培訓和幹部體制改革來審視中國共產黨更高層面上的國家治理策略，一個他認為可以理論化為新社會主義(Neo-socialist)的治國方略。這一理論概念的提出是為了回應目前海內外一種普遍存在的看法，即認為社會主義在中國已經消亡。彭軻從那些在黨校受訓幹部的認識出發，指出「社會主義」對於這群政治精英的意義：對他們而言，「社會主義」是一種治理方式(socialism as a form of governance)，是與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頁2)。也就是說，只要中共還是執政黨，中國就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在中共仍然執政的前提下，社會主義作為治理方式可以包容各種具體的策略。彭軻所謂的新社會主義的統治策略就是將列寧主義的政黨體制和部份篩選後的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技術有機地結合起來，生產出新的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國情的治理話語和策略(governmental discourse and strategy)。在這套話語的實踐中，社會主義黨國創造條件推動資本主義市場的發展，並通過市場的發展不斷地再造自身(reinvent itself)以適應新的環境，這一過程被彭軻認為是改革時期中共繼續進行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所作的努力(頁8-9)。

除此之外，彭軻還試圖在研究路徑上進行創新，超越現有的「國家—社會」二元對立的分析框架，提出「作為社會的國家」這一新的路徑(State as Society Approach)作為政治人類學研究國家機制的切入點。在他的黨校教育與幹部培訓研究中，彭軻指出，幹部是國家機制得以運行的基礎，而國家機

制則是幹部的生存環境(living environment)、生活方式(a way of life)、存在文化(a culture of being)和歸屬共同體(a community of belonging)。通過將國家機制看作幹部所生活的「社會」，並考察幹部在這一「社會」中的行動與表現(包括他們特殊的生活方式、社會關係、消費模式和文化慣習等)，我們將能夠更好地理解國家機制具體的運作方式(頁12-13)。

本書第一章交待了研究框架和田野調查的過程。第二章開始，彭軻首先討論了幹部(cadre)群體的範疇。他指出，幹部一詞在社會主義國家的語境中含義複雜多樣，容易混淆。它被理解成一個相對於「人民」或「群眾」的有特殊權力和地位的人群。但實際上這一群體內部又有很多分類，包括「基層幹部」、「領導幹部」和「非領導幹部」等等——他們不僅在政府部門中任職，各級黨組織、公共部門和國有、集體企業等機構中的領導都被籠統地稱為「幹部」。彭軻詳盡地解釋了從中央到鄉村不同級別的幹部管轄機構，並認為這種管理上的階層化為不同級別的幹部界定了其工作和生活的共同體(community)，塑造了他們對其從屬共同體的認同。接下來，彭軻轉向回顧中共黨校和幹部培訓的悠久歷史，並把焦點最終定於改革開放後的幹部體制改革和黨校系統重建更新工作上。在這個時期，中共中央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最終目的是為了建立一支高素質的幹部隊伍來為現代化建設服務。但彭軻指出，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黨校建設工作並不順利，真正快速的發展是在1993年胡錦濤任中央黨校校長之後。在此後一段時間裡，中央領導層在黨校發展的問題上優先考慮中央組織，並把政策制定和落實的權力收歸中央。這一顯著的改革方向為本書後文討論地方黨校發展的不平衡與困境埋下了伏筆。

第三章介紹了不同級別的黨校及其管轄機關的情況。彭軻指出，黨校是一個專門的黨屬機關——每個級別的黨校管轄權都直接歸屬於那個級別的黨委，黨委通過委任一個幹部教育培訓委員會(簡稱「幹教委」)來具體運作，其主要職能是制定和監督落實每年的幹部教育培訓計劃，而黨校本身只是執行機構。接下來，彭軻描述了幹教委和其直屬黨校的工作關係，以及和其他黨的直屬機關和政府部門的互動關係。這之後，他又討論黨校幹部教育和培訓的課程與內容。黨校教育和培訓分為學位課程和非學位培訓兩部份，課程與培訓內容都着重於提高幹部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共自身的意識形態理論的認知能力，指導他們將黨的理論和實際工作聯繫起來。在之後的章節中，彭軻零碎地描述了幹部們對這一培訓目標的看法與回應。

第四章以雲南省委黨校為個案描述了黨校中的工作和生活，包括黨校的

環境設施、行政和學術機構、教學和研究內容等，其重點在於闡述黨校是在怎樣的條件下（再）生產符合中共中央期待的地方政治精英的。彭軻認為，優越的黨校環境設施和專業化的教學研究機構，為地方幹部營造一個領會中央的意識形態和政策意圖、學習社會治理技術、塑造精英共同體認同的氛圍。在形成精英認同和領會政策意圖的基礎上，他們可以更好地運用學習到的科學文化知識和技術來治理地方。在非制度的層面上，黨校培訓還有一個非預期的結果是建立起受訓幹部和黨校教師之間的個人關係：後者經常成為前者在處理地方事務上的意見諮詢人，而前者則為後者的調研和掛職等方面活動提供人際資源的支持。

第五章討論目前幹部培訓市場化和權力中央化給地方黨校帶來的機遇與挑戰。1994年財稅改革等一系列權力中央化的措施給許多地方政府造成了財政壓力，而地方黨校的財政支出主要依賴地方政府。在地方資金不足的情況下，黨校不得不通過加入幹部培訓市場來自籌運營經費。彭軻發現，地級以上的黨校較能趕上潮流。為了吸引生源來創收，它們一邊在內部進行學科建設以爭取學位頒發權，一邊與國內外的普通高等院校合辦學歷／學位課程。在更高級別，財力豐厚的中央黨校也在其下屬分支開辦了面向企業家和其他公眾人士的培訓項目。對於那些參與合作的國內外普通高等院校而言，此類項目不僅可以帶來短期的物質收益，受訓幹部的政治資本很可能會在未來通過校友身份給它們創造更大的價值。一些國外機構則認為合作舉辦培訓活動有助於它們跟新一代的中國政治精英建立起良好的關係，並加深對他們的影響。這些跨區域跨國的培訓項目對於受訓幹部而言也是有益的，不僅提高了他們的教育水平，也有助於他們體會區域差異和學習發達地區／國家的先進經驗，更不用說名校的學歷和培訓經驗本身就對他們未來的升遷有很大的幫助。相形之下，那些低級別的尤其是貧困地區的黨校則面臨着嚴峻的生存危機。在財政資金匱乏和無力參與教育市場化的情況下，很多縣級黨校只能採取機關合併、減少職工、培訓外包等方式苟延生存。

第六章討論了黨校培訓對幹部們的職業影響。和許多當代中國精英政治研究的結果一致，彭軻發現教育水平在幹部升遷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黨校培訓對幹部們的意義更為重大，因為它提供的不僅是必要的知識技術和理解當前中央政策的信息，還有促進他們事業發展的人際關係資本。彭軻認為，這也同樣符合黨國的新社會主義治國策略，因為它一方面提高了官僚的專業技術水平，一方面也通過黨校社區共同體塑造了幹部對黨中央的認同，鞏固了黨組織階層化的管治體系。他同時也討論了作為新社會主義治國

策略的另外兩項內容—即有限公開的選拔考試和黨內民主選舉—如何有助於激勵那些有志於仕途的年輕幹部更深入地學習專業知識和技術，領會中央的意識形態和政策意圖。彭軻指出，中共通過這兩項技術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官僚體制運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從而加強了黨的執政地位。

最後一章總結全書，再度強調作為新社會主義統治策略之一的黨校培訓對於鞏固中共執政地位和適應新的國內國際局勢的重大意義。也是憑藉前文的論述，彭軻試圖回應目前學界和政界對於中國政治穩定性的質疑。他認為腐敗問題和列寧主義政黨體制在危機時刻的回潮是執政黨未來面臨的兩大挑戰，但他觀察到的中共富有彈性的新社會主義治國方略使他對中國社會未來的走向仍持有較為樂觀的看法。

縱觀全書，彭軻為外人了解中共黨校系統提供了異常豐富的素材，而其從國家治理術的角度來解讀黨校教育與幹部培訓亦頗有啟發性。然而筆者在閱讀時也感到，一方面本書內容很豐富，作者的理論雄心也很大；另一方面，本書在寫作結構和材料編排上卻顯得有些零亂。對於一些重要的主題，作者在不同的章節中都花費了幾段文字去加以討論，卻沒有一個統領的段落來歸納這些分散的材料所反映的觀點。比如幹部對黨校培訓課程和目標的看法，作者在第四、五、六章都涉及到了，但這些材料非常零碎，並未形成一個統一的論點。

材料編排上的問題也反映在主題、機構和人物的分類上。作者有關「黨校教育和幹部培訓」的材料涉及的不僅是黨校系統本身，還有國家行政學院系統、社會主義教育學院系統和提供幹部培訓的普通高等院校。在作者的描述中，這些系統都參與到幹部培訓的國家工程中；而在某些貧困縣，黨校、行政學院和教育學院本身就已經合併成三位一體了。但是作者並沒有闡明他進行短期訪問的國家行政學院和雲南幾個三位一體縣級黨校的情況在全國範圍內有多大的代表性，他自己也意識到前述各類機構之間的一些基本差異。在不清楚整體狀況和察覺到不同機構間的差異的情況下，把上述所有系統都簡單地放在「黨校教育和幹部培訓」這個大名目下來討論，可能是相當危險的。

同樣的，作者將黨校教育培訓區分為學位課程和短期培訓這兩個部份，也意識到了參加這兩類不同課程的人在黨校生活上的差異。比如在周末，許多參加短期培訓的幹部都會回家，而學位課程的學生一般都留在黨校裡。而在工作背景上，前者都是在職幹部，培訓之餘也在忙業務；而後者有些是脫產幹部，有些則是還沒工作過的研究生。作者在意識到這些身份背景和生活

差異的情況下，仍把所有這些人都雜糅在一起當作一個統一的「幹部」群體來討論，而沒有細緻分類地考察這些次群體（subgroups）具體的日常生活形態和際遇，也有將問題簡單化的危險。

實際上，以上這些分類問題的模糊性揭示了作者可能面臨的另一個困境：他的理論無法全然歸納其已有材料本身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儘管作者聲稱自己並不想也不能評估黨校教育和幹部培訓對國家治理的實際影響（頁181），但他在書中明顯表達出對這一影響的積極態度，以至於還取了一個“*The Good Communist*”的書名。在第四章中，作者認為優越的黨校設施環境和專業化的黨校教學研究有效地提高了地方幹部對中央的意識形態和政策意圖的領會能力，也學習到了各方面的科學文化知識和社會治理技術。在第六章中，作者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26.3%的幹部認為基本理論學習課程最有用，37.9%的幹部認為最新的中央精神和政策解讀課程最有用，18.5%的幹部認為指導他們開展具體工作的課程最有用。但不容忽視的是，仍有6.9%、4%和7.4%的幹部分別認為上述三類課程最沒用。同樣的，對於電子政務技術課程，分別有2.3%和11%的幹部認為它最有用和最沒用（頁144）。這時，定量研究的統計數據和定性研究的實際觀察發生了矛盾：作者在第四章中完全積極的結論要怎樣解釋第六章中近18%的幹部認為學習基本理論、理解中央精神與政策意圖以及指導開展具體工作等課程最沒用的意見？又該如何解釋11%的幹部認為電子政務技術課程最沒用的意見？

另一處模稜兩可的地方是幹部的文化慣習。作者認為黨校為幹部提供了一個暫時放下身份、等級和權力差異的場所，讓他們更加開放平等地來討論和互動（頁111）。然而，作者上一頁的描述卻顯示了幹部們既有身份造成的文化慣習的延續。他描述到，黨校課堂氣氛不太一般。學生不稱學生而稱學員，因為他們都是幹部，年齡與教師相仿乃至更大。課堂像政府會議，有紅色條幅，有服務員倒茶，學員在課堂上抽煙、隨時接聽手機、發言像在發表長篇的政府演說（頁110）。這些描述清晰地展示了塑造文化慣習的身份、等級和權力在黨校課堂中瀰漫。這種權力和身份差異同樣也塑造了幹部學員和教師在課堂中的互動。有些教師認為自己很難在比自己級別高、同時工作經驗更豐富的老幹部面前建立威信（頁109）。

最後，與他宏大的理論框架不協調的是，作者在一些主題上仍缺乏足夠的實證素材。筆者甚至認為，作者的研究框架本身也構成了對其研究的局限性。作者在第一章中建議將國家視作社會來考察幹部在其中工作生活的行動與表現，這些行動與表現包括他們特殊的生活方式、社會關係、消費模式和

文化慣習等（頁13）。作者更細緻地指出這些特殊的生活方式包括他們的食物、配偶、朋友和談吐方式的選擇，甚至還包括他們的子女上學的選擇（頁13、17）。然而在接下來實證研究的章節中，作者對除社會關係以外的其他各項着墨並不多，有些甚至根本沒有提及。在第四章中，作者只用了寥寥幾段來描述雲南省委黨校良好的設施環境和幹部在黨校內外的休閒活動（在校內參加體育活動，夜晚在宿舍唱卡拉OK，或者結隊去昆明市區吃飯）（頁81-85，五頁紙內有三張圖片，佔去將近一半篇幅）。即使是着墨較多的社會關係，作者也只是局限於黨校內幹部與幹部之間，幹部與黨校教師之間的互動。事實上，相比於作者宏大而全面的研究設計，他對幹部生活的考察基本上只局限於黨校的空間範圍內。他談到幹部離開黨校外出吃飯，但沒有談到他們吃了什麼，在飯局上有什麼表現，吃完飯後又有什麼安排。他發現很多短期培訓幹部周末都回家，但是他們離開黨校之後究竟幹什麼了，我們從文本中得不到任何信息。而即使是那些留在黨校內的學位課程學生，我們知道他們上了什麼課，課程內容是什麼，下課後他們有一些校內的體育活動；但除此之外，他們日常生活的其他細節，在黨校內或校外的，我們都一無所知。這些日常生活細節的消失，對於強調「日常生活」和「細節」的人類學研究來說，是莫大的遺憾。筆者認為造成這一遺憾的原因還在於作者「作為社會的國家」這一研究路徑。這一路徑固然有別出心裁的啟發性，但在作者的黨校個案中，黨校並不等於國家，黨校只是整個國家機器的一部份。它也不是參加黨校培訓幹部生活的全部場景——也就是說，黨校也不等於幹部工作生活的「社會」整體。作者這種把國家場景縮小為黨校空間（亦即排除了黨校以外的國家場景），而且排除了幹部生活中可能存在的獨立於國家的社會空間乃至私人空間（即將幹部純粹看作國家的代理人，他們沒有任何獨立於國家的能動性，所有的私人生活和社會活動都在國家的控制和影響之下）的方法取向，大概是造成本書無法呈現幹部日常生活全貌的最大障礙。

錢霖亮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